

# 韬奋新论

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 郝丹立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 韬奋新论

——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郝丹立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郝丹立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5

ISBN 7-80170-113-5

I. 韬… II. 郝… III. 邹韬奋 (1895~1944) —  
思想—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9868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 插页 212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 目 录

---

<b>绪论 韬奋研究的历史走向</b>	<b>1</b>
一、目的与对象的分离	1
二、目的与对象的颠倒	6
三、目的与对象的再颠倒	13
<b>第一章 青年韬奋的教育背景及其思想特征</b>	<b>27</b>
<b>第一节 文化功底与新闻事业</b>	<b>28</b>
一、国学功底	28
二、得良师指导	33
三、私淑弟子与时代风潮	39
<b>第二节 理性怀疑与自淑淑国</b>	<b>49</b>
<b>第三节 早期社会和政治评论中的思想特征</b>	<b>55</b>
一、五四精神的信仰者	56
二、文化批判的先锋	62
<b>本章小结</b>	<b>73</b>

<b>第二章 职业教育思想</b>	<b>75</b>
第一节 精英立场与民主启蒙	76
第二节 历史演进与中国特色	82
第三节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91
一、关于职业教育的比较特征	92
二、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原则与现实状况	94
三、关于职业教育的两层意义	96
四、关于妇女与职业问题	99
五、关于童工的职业教育	100
第四节 个性与就业	102
一、职业指导的缘起	102
二、中国职业指导特色	104
三、职业指导的要件及其难点	105
四、个性与职业之“真乐”	106
第五节 现代性与现代职业观念	109
本章小结	114
<b>第三章 《生活》周刊时期的思想（上）</b>	<b>116</b>
第一节 “有趣味有价值的周刊”	117
一、民间的声音	117
二、趣味与价值	121
第二节 积极入世的现代审美精神	129
一、科学主义的人生观	129
二、进化论的历史观	135
第三节 实用之美的生活态度	140
一、健康之美才是“真美”	141
二、美在于实用	145

第四节 言论自由与刊物独立	149
一、“真理愈辩愈明”	149
二、经济独立与精神自由	155
第五节 宣传、普及“三民主义”	163
一、关于“民生主义”	164
二、关于“民族主义”	169
三、关于“民权主义”	172
本章小结	180
第四章 《生活》周刊时期的思想（下）	185
第一节 激进的改良主义立场	188
一、矛盾的反蒋态度	188
二、决绝地反对“党争”	195
三、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199
第二节 自由的困境	212
一、超越言论自由	213
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215
三、不归的自由之路	223
第三节 知识分子观	231
一、对陈布雷评价的转变	232
二、对胡适评价的转变	239
本章小结	249
第五章 民主观研究	251
第一节 民主与专制矛盾的新形式	252
一、民主政治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	253
二、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	257

第二节 民主概念的价值矛盾	265
一、以西方议会为趋向的有限度的民主	266
二、“抗日的民主”与“宪政的民主”	267
第三节 “苏联的民主”与费边社会主义	276
一、邹韬奋与拉斯基	276
二、苏联民主与欧美民主	282
三、韬奋与《苏联的民主》	291
四、民主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297
本章小结	302
第六章 最后的归宿	305
第一节 争取言论自由	306
一、保证抗战胜利的前提	306
二、言论自由的依据	310
三、维护基本人权，捍卫言论自由	313
四、“人民”与“国民”	321
第二节 与民盟路线的内在联系	329
本章小结	334
结束语	336
后 记	340

## 绪论 韬奋研究的历史走向

韬奋于1944年7月不幸因病逝世。当年8月，沈钧儒即撰写了《悲痛的回忆》这篇悼念文字，拉开了持续近60个春秋的韬奋研究的序幕。根据笔者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材料，这近一个花甲岁月的研究过程，可以大体区分为3个阶段：1944年8月至1955年为第一阶段，同年8月3卷本的《韬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第1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1955年8月至1995年为第二阶段，同年10月14卷本的《韬奋全集》的出版，标志着第2阶段的结束和第3阶段的开始；1995年10月至今为第三阶段。在这3个阶段中，又各有区别于前后阶段的相应的学术视野，因而后者也经历了3个类似的发展阶段。本绪论将逐一清理和分析每一阶段自身的特征，试图再现近60年研究过程的演化图景和历史走向。

### 一、目的与对象的分离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就韬奋逝世的《唁电》指出：“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



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并接受了韬奋临终前的入党请求，认为这是“吾党的光荣”。<sup>①</sup>《唁电》充分肯定了韬奋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也奠定了第一阶段韬奋研究的基调——一个积极向党靠拢的爱国的民主人士。

以此基调为框架，沈钧儒、张友渔、张仲实、胡愈之等人，作为曾经同韬奋一起“为抗战、为民主、为进步文化而共同奋斗的朋友”<sup>②</sup>，于韬奋逝世以后的三四个月间，撰写了一批悼念性文字，其态度是客观的，其评价是中肯的：“他一直并永远立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面对着现实，有知识便求，有阻碍便解决，有黑暗便揭发，只问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害”，“韬奋先生是进步文化界的权威，是民主运动的斗士，是抗日救国阵线的领导者”，“二十余年来为民族解放，为民主政治，为进步的文化事业而不倦奋斗的伟大战士……”<sup>③</sup>他们敬佩的是韬奋的品格为人、事业追求，及其为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风范。这是一种平视的视角，是以其人格本身为基本尺度的“就事论事”的眼光：“‘九一八’以后的十年中，由于韬奋和年轻爱国者的不断的呼号，引起了‘一二九’的北平学生运动，促成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抗日救亡。一方面挽救了民族的危机，另一方面掀起了争民主的浪潮……在这中间，中国知识分子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韬奋是

①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②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 页。

③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31、73 页。

其中重要的一个。”<sup>①</sup> 只有亲身经历并志趣相投的同仁，才会有这样体认和感悟：将韬奋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与自己有同样的追求、相似的经历，然而又杰出的一员。作为韬奋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人生伴侣，沈粹缜的评价最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确，抗日时期他在重庆的一段时间内，不止一次的告诉过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他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开始，对祖国具有无限的热爱，随着当时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严重，他成为一个积极战斗的民族解放战士。国民党曾经对他有过三次正面的严重的胁迫利诱，他宁愿以六次困苦颠沛的流亡生活作为答复，绝无妥协余地。他对生活书店的事业爱护视同生命，但他毫不犹豫地，宁愿书店遭受反动派封闭，决不叛离读者群众。他是一个坚决的民主主义者，反对腐朽的独裁反动统治，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了他步步前进，终于经过曲折的道路觉悟到从自认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助手，进而要求参加党的组织找到了正确的归宿。”<sup>②</sup> 只有亲身体味了当时国民党专制和共产党民主的鲜明反差，并在经历了前者的一再打压、其理想追求一再破灭的挫折之后，才可能有如此的人生感受和政治抉择。

如果说，上述追忆和感悟性的文字，首先将韬奋当作“我们”中与大家平起平坐，只是较大家更为杰出的一员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共领导者的相关言论，则侧重于韬奋思想发展的政治定位，其中尤以陈毅发表于1944年11月的《纪念韬奋先生》一文为此类言论的代表：“我们熟知韬奋先生的历史，

①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1页。

②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他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最后以他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事业说，置诸共产主义者前列，可说毫无愧色。因此邹先生的道路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最终结合的道路。彻底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在邹先生一生历史实践中，又一次证明了。”<sup>①</sup>与上述的主要是基于日常经验和生活经历的颂扬式评价不同，在这里，陈毅预设了一个评价尺度——“彻底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对于韬奋的评价，多了一层基于历史进化论的上升发展过程的意义：既然整个社会历史的价值是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进化论意义上获取的，韬奋一生业绩及其生命的意义也当如此看待。

与前一种情感色彩较浓的颂扬式评价相比较，后一种政治定位性评价更加侧重于证明：以韬奋的人生经历为样板，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必须以这种高于个体生命的一般历史发展趋势为导向。1954年7月24日，茅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至于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的如何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从韬奋身上，又一度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的旧民主主义者，在战斗的考验中，是会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外皆然；这已是历史发展的规律。”<sup>②</sup>一旦被纳入这个进化“过程”之后，韬奋思想的意义只有从这一不断上升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中获取，背离这一“过程”或

①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② 《忆韬奋》，邹嘉骊编，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规律”来谈其思想的意义，就不再是合法的，甚至是荒谬的。

这一高悬于个体生命之上的“宏大叙事”模式，在1950年代初已经开始主导了韬奋研究的领域。根据这一模式，韬奋所言所行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体人格的意义。1950年出版的黄逸之所著《韬奋》一书中，已经出现了修改事实以服从政治的描述：“对于党的主张，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还有事实可以证明，例如‘九一八’后，党提出了联合抗日方针，先生便坚决地为这一点而奋斗，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他的一生，早已具有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德”<sup>①</sup>。这就是韬奋研究中著名的“九一八转变论”（详见本书第四章）的滥觞。事实上，韬奋于1928年“济南惨案”后，即已开始为消除“党争”，动员全民族力量抗战而奔走呼号，“联合抗日”是他早已独立提出并一以贯之坚持下去的政治主张，而他开始注意到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则是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尤其是在当年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之后。此后，他还就“统一战线”这一概念前，究竟应当冠之以“人民”还是“民族”，同莫文华（刘少奇化名）之间产生过不无原则意义的分歧（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黄逸之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曲笔”，是因为他已经为韬奋预先设定了一个“拥护党的主张和毛泽东思想”，并且“早已具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的外在“目的”，这种观念在先的眼光，使得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目光由“平视”而改为“仰视”：“韬奋先生是和人民大众永不分离的，由于他严格地服从人民的利益，所以他的政治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他忠诚虚心地为人们服务，所以他

<sup>①</sup> 黄逸之：《韬奋》，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60-61页。

的工作态度是实际的，缜密的，不知疲倦的。因为他热爱人民，所以为人热情，天真，亲切。他不断地向群众虚心学习，所以能够永恒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和群众一起进步。他这些高尚的品德，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他走的道路，也是我们应走的道路；韬奋的精神，永垂不朽！”<sup>①</sup>作者在文字中流露的感情是真实的，要求进步、拥护党的主张和毛泽东思想的愿望，也是发自肺腑的。然而，正是在这种真诚之下，不仅事实遭到了歪曲，而且韬奋待人接物之中的热情、天真等等性格特征，这些在前述的颂扬性评价中令人如坐春风般的亲切感受，这些被当作人格亮点加以表彰的人格要素，在上述一连串“因为……所以……”的句式里，都成为受某种先在的崇高观念推动而出现的“高尚的品德”，成为一种“永垂不朽”的“精神”，而不再具有个性化的意义。此时人们注视韬奋的目光，已经是对某种高高在上的崇高目的的赞颂，是对某种唯一的人生模式的膜拜，而不再是对一位平易近人的出版家、政论家的尊敬。此一阶段的韬奋研究，已经逐渐出现一种目的高于研究对象本身，意义游离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目的论倾向。

## 二、目的与对象的颠倒

随着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镇压“胡风反党集团”等等思想改造运动接踵而至，在1955年8月由“《韬奋文集》编辑委员会”撰写的《韬奋的思想的发展》（该文作为《韬奋文集》的序刊于该文集的篇首和韬奋所著的《经历》一书的篇首。以

<sup>①</sup> 黄逸之：《韬奋》，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61页。

下简称《发展》)一文中,这种倾向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盛行于韬奋研究领域40余年的“外在目的论”的研究视野。理解这一视野的价值倾向,关键在于三个方面。

(一)关于“韬奋的最大贡献”。《发展》指出:“韬奋在一九三一年以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抗日运动中,在颠沛流离之中,逐步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群众,因受他的影响,在政治上逐步觉醒过来,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大道。这就是韬奋一生中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最伟大的贡献。”<sup>①</sup>的确,笔者的公公,就是当年那些“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群众”当中的一个。他就是受《新生》和《大众生活》的影响,于1938年从上海辗转到达延安求学于抗大,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从这位85岁的老人口中,也了解到当时确有一大批知识青年在韬奋的感召下奔赴了抗日前线。《发展》的这段描述以及结论中“最伟大的贡献”,大体上与历史实际相符合。

“大体上”这个限定词,当然是“不完全”的意思。这段描述的不完全在于:1. 韬奋对马列主义的接受,同时伴随着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接受,在许多问题上,韬奋深受费边社会主义思潮和拉斯基的影响,并且在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根本立场上,始终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因此,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杰出的民主斗士,但却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详见本

<sup>①</sup> 转引自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页。

书第五章第三节)。因此说他在“马列主义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意义上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就不十分妥当；2. 许多知识青年在韬奋精神的感召下走上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道路，这确是韬奋的一个最伟大的贡献，但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最伟大”往往变成了“惟一”，事实上，整个第二阶段的韬奋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惟一”的角度上展开，以论证这一“贡献”为目的的。其结果，带来了韬奋研究视野的逼仄化和工具化，即凡是与这一“最伟大的贡献”不相吻合、甚至相抵牾的研究材料和研究眼光，就被尘封起来，不再被人们注意与领会；随着韬奋越来越“革命化”、“马列主义化”，那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韬奋也就隐匿起来，不再与我们对话了。

(二) 关于“韬奋的道路”。随着“最伟大”被“惟一”起来，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韬奋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发展》指出：“韬奋的一生，是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道路是广大的有善良愿望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sup>①</sup> 这一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化，其预设的依据就是上述所谓的历史进化论的规律，然而将其安放在韬奋头上时，却缺乏韬奋个人经历尤其是其思想发展的证明。实际上，韬奋毕生为之争取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他一直将这种信念保持到逝世之前（详见本书第五、第六章的相关描述和《结束语》）。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确实是五四以降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但

<sup>①</sup> 转引自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页。

是这种转化，应当包括思想观念上的根本转化。判定一个人究竟是否是马列主义者，尤其应当以思想观念上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尤其是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具有根本性质的观点为尺度。我们应当在研究视野上有一个区别民主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原则界限，这是其一；其二，对于韬奋这样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斗士，其贡献不一定就是马列主义意义上的贡献。对历史贡献的大小，并不一定以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先决条件。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民主主义传统有着不解之缘一样，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的历史发展乃至当代发展，也与民主主义的传统及其当代形态有着不解之缘。而这也许才是韬奋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真正贡献所在，也才是韬奋研究的最重要的当代意义所在。只有发掘出与韬奋思想发展的实际相符合的“韬奋的道路”，才是实事求是的韬奋研究，这样的研究，才可能有真实的客观的价值。

（三）关于“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规律”及其“两个态度”。既然韬奋的贡献及其道路都已经被规定好了，那么随之需要的，就是从中引出的“规律”即“一般性”了。这是整个《发展》立论的关键点。《发展》指出：“从韬奋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革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规律。这里有两个基本关键问题；一个是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第二个是对工农群众和对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态度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sup>①</sup> 这里的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之所以会成为“规律”，其原因在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是走向革命？还是走向反革命？”

<sup>①</sup> 转引自韬奋：《经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1 页。



决定于对上述两大问题的态度，这是知识分子走向的分水岭。韬奋采取了革命的态度，所以能够从原来觉悟不高的地位迅速走上革命的大道，并推动了当时一代的青年前进。胡适等人则走着相反的道路，一步一步地下沉，以至完全成为美帝国主义豢养下的走狗。”<sup>①</sup>

至此，韬奋的“最伟大的贡献”、“道路”及其“规律”与“态度”已经全部准备就绪，韬奋研究的目的也就彰显出来了，这就是：配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解决知识分子对待革命、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为旨归，并为此设定了韬奋和胡适正反两个典型，前者为革命的态度，后者为反革命的态度：“凡是对帝国主义还多少保持着幻想的人就必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生动摇，而凡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就容易受到帝国主义的诱感和欺骗，以至有受帝国主义利用、背叛祖国的危险”，而“凡是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一定是看不起工农群众，也不会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有从集体主义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韬奋是真正相信共产党的人……韬奋从游历苏联之后，即坚决提出‘克服个人主义’的口号，一九三五年《大众生活》的创刊词上，并把‘克服个人主义’列为三大纲领之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抛弃个人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觉悟。”<sup>②</sup>可以说，五四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学识修养上深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民主政治信念的熏陶，而自由主义又称“个人主义”，它与马列主义学说有着极大区别。这里的“集体主义”就蕴含着

① 转引自韬奋：《经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2—13 页。

② 转引自韬奋：《经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3—14 页。